

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

惊动毛泽东的“黄逸峰事件”

建国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

林蕴晖 著

# 国史札记

## ● 事件篇 ●

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

东北局“五虎将”冤案始末

反右派斗争党内“战场”的一角

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

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1960年代中国造神运动的起源

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

解读：毛泽东讨厌“四个伟大”

东方出版中心

林蕴晖 著

# 国史札记

• 事件篇 •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史札记:事件篇/林蕴晖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8

ISBN 978-7-80186-892-3

I. 国… II. 林… III. 历史事件—中国—现代—文集  
IV. K27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0991 号

**国史札记——事件篇**

---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365 千

印 张:24.25

插 页:4

印 数:0,001—6,000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892-3

定 价:4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写在前面的话

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很快就到花甲之年了。对前三十二年的历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曾作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均做过结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更倍受世人关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必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

历史研究，既要有宏观研究，也要有微观研究。既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导面，也不能忽略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或失误。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缺少第一手历史资料，对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很少了解。就连我这个从事多年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也多有迷惑不解。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机构编辑、出版的大量文献、大事记等史料集，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回忆录、口述史等等，为人们探寻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和内情提供了较此前更多的条件。这本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专题集纳，就是笔者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书籍资料为依据（只有极少资料为本人访谈笔录、个别前辈的口述史），逐一考证研究的成果。应当说明的是，对上面涉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局限和现有材料的限制。因此，书中不足甚至不实之处，敬希读者批评、匡正。

#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	1
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 .....	1
“不要四面出击”是个战略方针 .....	23
重读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 .....	32
惊动了毛泽东的“黄逸峰事件” .....	40
李立三为何被戴上了三顶“帽子” .....	45
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是非 .....	60
建国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 .....	71
“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 .....	87
“讨安伐刘”的组织工作会议 .....	106
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 .....	117
东北局“五虎将”冤案始末 .....	132
毛泽东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释疑 .....	139
扬帆冤案的诱因辨析 .....	149
中共八大与“以苏为鉴” .....	154
中共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原委 .....	164
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估与走中国自己的路 .....	169

1950年代中国起步探索道路的矛盾及其逆转的教训	181
反右派斗争党内“战场”的一角	189
赖若愚缘何重蹈李立三的覆辙	201
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	214
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	226
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233
1960年代中国造神运动的起源	243
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分歧与中苏关系恶化	256
1960年代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争	265
“大跃进”与1960年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276
彭德怀去西南三线的前前后后	290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修订再版与在“文革”中的命运	296
《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	307
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	319
解读：毛泽东讨厌“四个伟大”	328
见证两个时期中国农村变革的走向	
——杜润生与毛泽东和邓小平	337
由“谈不拢”到达成一致的诀窍	
——邓小平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方针	347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与苏东剧变	354
附录：对历史资料的鉴别与使用	365
记龚育之指导建国后的党史写作	
——痛悼龚育之先生	374

## 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

刘少奇 1949 年 4 月受毛泽东委托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在与天津资本家座谈中,刘少奇曾说过,资本主义剥削,在现实的中国不是罪恶,而是有功劳的话。此后,被人攻击为鼓吹“剥削有功”。因此,在中共党内一再掀起波澜,直到 1960 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成了刘少奇一进城就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罪证”。

历史档案表明,关于在现实的中国,还需要“欢迎”资本主义剥削的话,刘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 5 月 12 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 月 19 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 月 28 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至直到 1950 年 1 月 23 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像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这段历史公案,话还得从头说起。

## 中共中央的建国方略

中国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建国的基本方略,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既非资产阶级共和国,亦非社会主义共

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到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更具体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是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主导,有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以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说: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



归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并派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受工作主要是接受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受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一波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决议强调：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就必然地会使我们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 由乡村转向城市的阻力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而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故其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河北、山西的井陘、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

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此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在济南和北平等大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据1949年2月7日济南调查组的《材料之七》记载:“店员、工人要求分店散伙……最近据说已有一家银号分了,是店员自动搞的,并已私下了结。”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城市接管情况的报告也指出,各地存在着“盲目的无限制的提高工资”,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的现象。<sup>①</sup>

而在此时,中共党内相当多数的干部对中央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不甚理解,东北解放以后,在中共吉林省、市的领导层内就曾发生过多多次争论。当时的吉林市委书记孔原提出:“联合自由资产阶级的出发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十六个字不只指导经济,还指导文化、指导政治。他认为当前解决工人的生活,“首先是失业问题,其次才是工资问题”,多数工人主要要求有工作做。但部分省委领导却认为市委犯了右倾错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帮助资产阶级,也不应帮助资产阶级”;“资本家只是追求利润,加重剥削”。并说“把十六个字当作是联合资产阶级的出发点”是产生右倾错误的根源。<sup>②</sup>

凡此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中共中央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一切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sup>①</sup> 转引自黄小同、李文芳著:《刘少奇与天津讲话》,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7~18页。

## 民族资本家的忧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厂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如: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等,都靠他们供给。这些私营工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唐山有个启新洋灰公司,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半年合同,收购它生产的洋灰,后来物价上涨,合同订的价格就明显太低,继续执行合同,资本家就得赔本;当地的华兴纱厂也跟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八个月的合同,贸易公司供给棉花,华兴将生产出来的纱布卖给贸易公司。后来纱价大涨,但合同价不变,这样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华兴虽未赔本,也没有赚多少钱。而税务部门收税,还得按市场价格收他们的税。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卖不掉,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说是可以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于是久大公司就把盐运到了临清。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作卖盐生意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国营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一跌,使得资本家的盐卖不出去,蚀了本。弄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组织则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两市的财经情况说,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华北局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指出:除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

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 53 起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 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sup>①</sup>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干部、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心存的疑惧,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 刘少奇辩证论剥削

1949 年 4 月 9 日,刘少奇在出发去天津的前一天,接到由毛泽东转来薄一波的报告,谈及目前平津工业生产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 城乡交换未恢复,对外贸易不畅通,原料来源缺乏,产品销路不广。

(二) 一面通货膨胀,一面又银根吃紧,资金周转不灵。但原料及工资等开销又必须按时支付(出入口商需事先支付外汇),过去经营的业务,一套资本家就行了,现在需要两三套。

(三) 某些干部对资本家的困难,未敢正面提出(怕说右倾),对工人的自发斗争,也未表明态度(区委一般是默认了)。有些工厂,劳方需要过高,资本家不敢不答应;有些工厂,资方“自动”提高工资,结果生产受到严重打击。比如天津在解放初期,国营企业工资最高,私人大企业次之,中小企业又次之。现在完全反过来了,中小企业最高,私人大企业次之,国营企业又次之。这样高额工资,中小企业是支持不下去的。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怕清算,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怕以后工人管不住了(没规矩了)无法生产。

入城后我党还没有宣布过有关工商业政策、劳资关系及劳动条件,特别是

---

<sup>①</sup>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50~51 页。

工资工时等的政策法令,只发出一些依靠工人阶级的宣言。直至现在,国营工厂仍只发维持费,有的叫临时工资。私人工厂尚未有工资标准,劳资双方都摸不着底。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后一个月内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北平济通银号店员曾要求把该号资产(约值60条黄金)按所谓“劳资两利方针”,由劳资双方平分。北平私人工商业的70%,天津90%已经开门云云,并非真正开门,大多数都是虚应故事“半开门”而已。<sup>①</sup>

这份报告,使刘少奇对到天津要解决的问题,心中更加有数。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前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了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以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sup>②</sup> 参加座谈的有: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斐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管辖行经理资耀华、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朱继圣、恒源纺织厂董事长、经理边洁清、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天津市商会理事长毕鸣歧以及劳笃文、王翰庭等在全国、在华北知名的天津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允许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李烛尘、宋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

<sup>①</sup> 转引自黄小同、李文芳著:《刘少奇与天津讲话》,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8页。

<sup>②</sup>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96~109页。

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

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注意看中共中央公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加上天津解放后,宣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这就使他们看不到资本家的前途。要解开这样一些思想疙瘩,怎样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这“剥削”二字上做他们的文章。刘少奇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你们开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的,有义务有责任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刘少奇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说起。他说:

剥削不剥削,不是由你们决定,也不由工人决定。“剥削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在最初的人类社会中是没有剥削制度的,后来才有了奴隶社会的剥削制度、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别人就得剥削你,你不剥削也不行,你被别人剥削也不行,这不是由人的意识决定,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条件决定的。

当然,这几种不同的剥削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最初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历史的一定时期也是有进步性的,后来反动了也就被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在青年时期是有历史功绩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时期内,把生产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

至于,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那要看是否具备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在欧美资本主义已经很发达的国家,可以废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还没有组织好,所以还没有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确私人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做“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同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中国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思想,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而说了在现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具体说的是:

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失业工人要求你们资本家复工,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刘少奇指着宋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你们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可见,刘少奇在讲资本主义剥削的进步性,工人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在今天的中国资本家办的工厂越多功劳越大的话,都是有前提的。并没有抽

象地讲什么“剥削有功”的话。

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止步，他进而对资本家们说，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

他们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刘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二十年后，他已发展到八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八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八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八个工厂，让你管十六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总之，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不管历史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区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同，欢迎资本主义的剥削，正是为了在中国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一切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刘少奇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说。

经过刘少奇一番有针对性的、耐心的教育和开导，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精辟入微的辩证解说，使在座资本家心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地。他们不无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他们中不少人感到，长期怀抱的实业建国的大志，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



机会,因而,纷纷筹划恢复生产,扩大生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宋棐卿可谓是其中的一个代表。1949年4月30日,宋棐卿致信刘少奇<sup>①</sup>称:

“阁下惠临训话<sup>②</sup>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

- 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
- 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
- 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
- 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

以上各项知关廛注,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

宋棐卿的信,如实地反映了刘少奇在天津向资本家对资本主义剥削作的辩证解说,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 天津效应在上海发酵

上海解放前夕,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状态。一万二千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产业工人有83万。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的纺织厂纱锭229万,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全市私营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6%,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一万七千余人。他们数量集中,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政治影响大。解放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11页。

② 1949年4月21日,刘少奇参观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并对职工代表讲话,阐明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